

目 录

总论:正在崛起的“新鲁军”	吴义勤/1
山东青年小说家论	施战军/20
山东青年诗人论	张清华/34
山东青年散文家论	王景科 刘新英/51
执著于女性心理的探究 ——于艾香小说论	周宝红/63
我爱人群	于艾香/78
性别关怀及其衍生物 ——对马枋小说的一种解读	孙桂荣/83
居心叵测地生活	马 枋/97
隐隐作痛的爱 ——读王夫刚诗作有感	马 静/99
我所理解的诗歌传承	王夫刚/111

- 在自己的精神领地里作酋长
——谈王开岭思想随笔创作
王曙光/114
- 散文的品质
王开岭/121
- 大地上的梦魇
——王方晨论
赵月斌/123
- 变化即出路
王方晨/147
- 多时空视域内执著的生存关照
——瓦当小说论
李翠芳/150
- 小诗学
瓦 当/160
- 现世关怀与神秘体验
——王秀梅小说印象
李慧君/162
- 快慰就好
王秀梅/172
- 在现实中成长的理想主义
——王黎明诗论
李文杰/175
- 诗歌是贫穷的财富
王黎明/189
- 寻找失去的……
——卢金地论
赵月斌/193
- 卑微和无用
卢金地/208
- “道德化”的乡土世界
——刘玉栋小说论
吴义勤/210
- 通向内心的路
刘玉栋/226

- 物质时代的精神漂泊意象
——论老虎的小说
贺仲明/229
- 我的两栖生活
老虎/240
- 从乡村歌手到大话英雄
——江非近期诗歌解读
赵月斌/244
- 一份修订的个人提纲
江非/269
- 迷宫中的守望
——读刘照如
赵月斌/272
- 小说的困难
刘照如/282
- 埋在泥土里的关怀
——读陈原的散文
周幸/285
- 我离工业和农业都很近
陈原/295
- 历史转型期的乡村喜剧
——评张继的小说创作
段崇轩/298
- 喜欢小说
张继/309
- 轻松的姿态与分裂的自我
林舟 齐红/312
——评宋潇凌的小说
- 在想象中抵达自由
宋潇凌/325
- 不绝的寻找之旅
张岩/328
——周蓬桦小说论
- 迷宫的游戏
周蓬桦/342

在诗意的迷雾中踟蹰 ——凌可新论	赵月斌/344
面对乡村的写作	凌可新/365
陶纯小说解读	李掖平/368
夕阳下的挣扎	陶 纯/375
生命情缘 ——晨义散文论	王 璟/378
文学是母语的方舟	晨 义/387
叩问与守望 ——雪松诗论	于京一/390
品质写作	雪 松/406
风中舞蹈 ——路也小说论	刘传霞 石万鹏 田丽红/409
诗和小说混为一谈	路 也/422
后 记	/425

□卢得志

把培养扶持文学新人、 青年作家作为一项战略措施去抓

——《山东青年作家论》序

青年作家是繁荣创作的生力军，是山东文学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上世纪 80 年代，山东一批青年作家以其骄人的创作成绩，打出了文学鲁军的品牌。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又一批文学新人在文坛崭露头角，他们起步早，起点高，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成为文学鲁军新锐。

着眼于新世纪山东文学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从 2000 年起，我们明确提出，把大力培养和扶持文学新人、青年作家作为一项战略措施去抓，从文学新人和青年作家的组织动员、培养引导、管理推介、扶持激励等多方面，发挥作协的职能优势，开展了一些具有示范性、导向性的活动，采取了一系列具体切实的培养扶持措施。这次组织文学评论工作者，集中对山东青年作家群和部分有代表性的优秀青年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编辑出版《山东青年作家论》，就是继 2001 年推出十卷本《文学鲁军新锐文

丛》之后的又一项实际的工作步骤和举措。

此举目的有四：一是“点点兵”。通过这项工作，对山东青年作家的阵容，作一次比较全面的检阅。二是“亮亮相”。通过这种方式，对山东青年作家队伍的创作成绩作一次集中展示，对优秀青年作家作一次集中推介。三是“把把脉”。请评论家把山东青年作家队伍放到全国青年作家阵容的大坐标系中作出总体评价，对各位青年作家创作的经验得失和发展态势作出理性分析，使青年作家通过评论家的视角反思自己的创作实践，以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四是“鼓鼓劲”。列入《山东青年作家论》的青年作家，是经过专家认真研究，从全省青年作家中推选出来的成绩突出、特点鲜明、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代表，此举本身就是一种表彰和鼓励。

值得提及的还有两点。一是参加这次研究活动的文学评论家大都是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近年来，山东一批优秀青年评论家脱颖而出，非常活跃，为全国文坛所瞩目。这次在他们为青年作家点兵、亮相、把脉、鼓劲的同时，也展示了我省青年评论家的整体实力和风采。二是参加研究的评论家，多是在高校和社会其他部门工作的同志，这为作协在自身评论人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发挥职能优势，组织社会的评论力量，紧紧围绕繁荣文学创作和多出优秀人才，开展文学评论，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青年作家论/山东省作家协会编.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10

ISBN 7-5329-2482-3

I. 山… II. 山… III. ①青年—作家—概况—山东省—当代②当代文学—文学评论—山东省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01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2 千字/311
定 价 26.00 元

□吴义勤

“道德化”的乡土世界

——刘玉栋小说论

20世纪90年代的山东文坛曾经因为山东新生代作家的成长滞后而产生过巨大的焦虑和持久的争论,其后,对新生文学力量的发现和寻找就成了山东文学界的一个广泛共识。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山东新生代作家群逐步浮出水面,并开始为文坛注目,刘玉栋、老虎、王方晨、凌可新、卢金地、刘照如、路也、宋潇凌、马枋、瓦当、闵凡利等作家的崛起无疑为新世纪的山东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但是,山东的新生代作家与全国的新生代作家相比,又有着特别深厚的地域标志,齐鲁文化的烙印以及山东主流文学传统的影响,都使他们不可能如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一样旗帜鲜明地走上异端、先锋、“断裂”的写作之路。他们的面孔不免中庸甚至暧昧,但也正是这种中庸暧昧确立了他们与众不同的风格,呈现了与众不同的价值,当然,也先天性地孕育了他们的局限。可以说,作为一柄双刃剑,山东新生代作家得到的和失去的几乎一样多,这是他们“成长的烦恼”。这方面,刘玉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刘玉栋的小说近年来日益呈现出令人高兴的“井喷”态势,不仅连续出版

了《锋刃与刀疤》、《我们分到了土地》两本小说集,而且《我们分到了土地》、《给马兰姑姑押车》、《葬马头》、《火色马》等小说还被反复转载并多次获奖,为他和整个山东新生代小说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刘玉栋的写作同样面临着某种困境,如何超越自我,如何挣脱“影响的焦虑”,如何突入更高的艺术境界是他需要解决的难题。

—

与作为一种类别现象的时尚、浮躁、凌厉的新生代小说不同,刘玉栋的写作给人一种厚实、稳重、沉静感觉。虽然,就文学艺术而言,厚实、稳重、沉静并不是什么好词,但是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生代作家那种普遍性的狂妄、轻浮、喧嚣的背景,刘玉栋的写作姿态确实具有特殊的价值。然而,对刘玉栋来说,这种厚实、稳重、沉静又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姿态,而是与他的生命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厚实、稳重、沉静是刘玉栋个性的体现;另一方面,这种个性又是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的,这个地基就是对民间、乡土世界的热爱与呵护。进入刘玉栋的小说世界,我们会发现,“乡土中国”是他小说的终极意象,他所有的小说其实都是在从不同的侧面还原、建构“乡土中国”的形象与内涵,这也决定了刘玉栋是一个典型的乡土小说家。他的小说题材均与乡村世界和民间世界有关,他的眼光有时也会向都市张望,但那最多只能算是一种“偷窥”,这种“偷窥”反而会进一步强化他对乡土的执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刘玉栋的小说中“乡村与都市对峙”的主题,也只不过是一种潜隐的、假定性的主题,刘玉栋从来就没有让它正面展开过。

当然,刘玉栋的“乡土中国”又不具有“宏大叙事”的特质,而是真正本源和民间意义上的“乡土”叙事。“齐周雾村”是他笔下“乡土中国”的一个象征或缩影,这个“乡村”固然有着时代、历史、政治等等的烙印,但刘玉栋着力发掘的却是“乡土中国”原始、混沌、模糊、恒定、暧昧的内涵。这方面,《平原的梦魇》是一个典型的文本。“齐周雾村”成了一个虚幻的影子,一个“梦魇”、房屋、街道、黑二叔、三爷爷、奶奶,全都成了凝固的意象。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变,时间的意义仿佛消失了,“乡村”似乎成了一种永恒的不变的存在。《雾似的村庄》透过汝东一家的“传奇”折射的也正是“齐周雾村”从古至今绵延不息的风土人情,而《平原六章》以童年视角对“平原”人生的感受、《跟你说说话》对乡村家庭内部人性风景的展现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微型叙事”的特征。即使《给马兰姑姑押车》、《火化》这类试图把对“乡土”的观照提升到文化意义上的小说和《昏夏》、《干燥的季节》这类批判乡村权力结构和丑陋人性的小说,作者也有意回避“宏大话语”的侵袭,而是基调定位在愚昧、沉闷、迂腐的普遍人性上。

我们看到,在刘玉栋的小说中,他在隐藏或悬置时代和时间因素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把空间的意义放大了。在他的艺术空间内,乡村的生存、精神和人性状态以及面对世界、他人和生命本身的方式与态度则无疑是其艺术聚焦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笔下的“乡土”又不单纯是一个符号化的乡土,甚至也不是一个“文化”的乡土,而是一个人性的乡土、感情的乡土、生命的乡土、道德的乡土。“乡土的道德化”是刘玉栋的价值支撑,也是他的叙事策略。而这无疑也决定了刘玉栋“乡土情结”所隐藏的深刻悖论,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唱着土地的赞歌,对乡村的淳朴人性和伦理情怀满含敬意;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正视乡村道德日益颓败和沦落的现

实,因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唱出对土地的挽歌。可以说,他越是试图在小说中隐藏或悬置时代性的因素,他的情感和价值观的矛盾就越是暴露无遗。当然,对小说来说,这并不是坏事,正是这种矛盾和悖论构成了他小说的内在张力和思想艺术魅力。

首先,刘玉栋在他的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乡村生命对于土地的依恋与热爱,渲染了依附在这种土地上的淳朴情感、人性和温暖。《雾似的村庄》中汝东作为一个“传奇性”的英雄,他之所以放弃部队的一切“装病”回到故乡,正是因为亲情和土地的双重召唤;《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爷爷对土地的“虔诚”以及在土地上的“献身”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恋土”所可解释的了,而实际上已经成了对土地的一种宗教,一种信仰;《火色马》中母亲对儿女的感情以及对逝世丈夫的感人至深的怀念方式都是一种典型的乡村情感,而《葬马头》中刘长贵与滚蹄子马的感情、《高兴吧,弟弟》中农家兄弟之间的深情、《平原六章》中哥哥放走买来的四川女人的情节都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人性 with 情感的光芒。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对乡土世界的诗化处理方式不同,刘玉栋对乡土的书写并不是为了建构一个反现代性的乌托邦,相反,他不回避对乡土世界内的丑恶、苦难和灾难的描写,乡村的愚昧、保守、落后在他的小说中都有着充分的展现,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苦难和罪恶,不是为了简单的批判,而是为了在冷酷中展现和寻找温暖的力量、人性的光芒。《雾似的村庄》中二十六岁的乃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站在工地做着关于媳妇的梦死去了,这本是一个悲凉而残酷的事件,但是他做梦的姿势,“站在土地上,做完了自己一辈子的梦”的死亡方式又实实在在地给我们一种温暖的感觉。《平原六章》中六岁的弟弟为了换糖吃而从墙头摔了下来令人悲伤,但回过头来想想,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一颗糖会带给弟弟们多少温暖呢?青年评论家洪治纲

称刘玉栋的小说是一种“温情叙事”，“他总是选择一种温情式的话语基调，朴实而又平和地叙述着一个个饱含鲜活生命情态的故事。无论是乡村社会还是现代都市，无论是人生的剧痛还是生存的无奈，在刘玉栋的笔下总是流淌着款款的温情和隐隐的愁绪，映射着浓郁的体恤之情和悲悯之态，从而使他的小说显示出别样的审美情趣”。这确是中肯之论。

其次，在表达对土地和乡村情感的依恋与赞美的同时，对“变质乡土”的哀叹，对人性沦落和世态炎凉的忧虑与批判也是刘玉栋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线索。《雾似的村庄》中乃木的死可以说是对人性“恶”的一种控诉，在乃木卖艺的瓷缸里放大便的丑行，不仅摧毁了善良、忠厚、勤恳、通灵的乃木的生存意志和对这个世界的信任，而且也预示了刘玉栋所建构的乡土道德神话的崩溃。在这个意义上，乃森决绝的对乡土的告别和汝忠的老年离乡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乃森建设家乡梦想的破灭固然令人悲伤，而汝忠的出走则更是对他一生的巨大讽刺，他的绝望无人能够拯救，正如小说中所写的：“为什么人就不能多一些同情，多一些温暖？战争似乎也没有这样残忍，它有的是悲壮，是仇恨，是激情，是大义凛然、铮铮铁骨。在这一时刻，汝东仿佛又感觉到战争的激情，他体内的血液在狂奔在燃烧，他真想提着斧子把那家伙们的脑袋都一个个砍下来。”尽管小说的最后乃森还是回家乡打坟来了，作家还试图给小说安一条“光明的尾巴”，但乃森终究没有因村长的呼唤和眼泪而停下自己的脚步，他的回来其实是为了更决绝地告别。《干燥的季节》中乡村权力的专横以及对王久贵和王喜祥父子的伤害已经从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于久贵的“哑”是其话语权、生存权被剥夺的象征，而王喜祥的磨刀也不过是一种虚拟的反抗行为，也许他的刀永远也不会砍到村长和他的儿子刘全头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霍

霍的磨刀声中、乡村的温情和诗意是一去不复返了。《昏夏》中马东以金钱对权力和道德的挑战以马东的再次被捕而落幕，但是他临走时对三羊发出的“你告了我状，我日了你老婆，咱们打了个平手”的宣言，却使人不能不对乡村世界道德大厦的崩溃悚然心惊。《葵花地》中村民因为葵花对艺术家二胡的仇视与残害、《花花琉璃玻璃球》中黑二对铁椎和他姐姐的伤害都是对乡土世界中人性之恶的一种揭露。而《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父亲对母亲的遗弃和对爷爷之死的冷漠、《和你说话》中叔叔和婶婶的离婚、婶婶的自杀、父亲的偷窃也彻底解构了那种有关乡土的脉脉温情。在这方面，《秋日无风景》更像是一篇伤悼“变质乡土”的抒情诗。主人公爱农是一个地质工作者，他的名字“爱农”本身就有某种寓意。他对土地也确实充满感情，“这个秋天的早晨，虽然有穿不透的雾幔，可田野依旧是这样迷人，就别提各种各样的气味了，那腥甜的泥土味儿，那润静的艾香，还有远处果园里飘来的那清幽幽的苹果香气——它们混杂在一起，被爱农深深地吸进肺里，溶入血液，说不出有多么舒畅，但是他脚下的土地正在变得越来越“俗气”，而作为他精神寄托和美好初恋象征的葡萄园也正在被改造，“一切都过去了，那童话般不沾一丝尘埃的一切，像肥皂泡，像流星，像一切美好的童年，都消失了”。

可以说，正是从这两个基本的主题线索和精神线索出发，我们看到刘玉栋的小说内部充满了城市/乡村、留恋/批判、回乡/离乡、现代/传统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但是，无论从精神的哪一极来看，刘玉栋对乡土的书写都没有突破道德的界线。对土地、现实和人生的道德化的审视既赋予小说以道德关怀和伦理关怀的力量，也使小说具有了某种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的意味。与此同时，道德视角的普泛化，又有负面的价值。一方面，它减弱了现实批判的力度。应该

说“乡土中国”的问题,既有着道德的因素,又远不是道德所可承担的,而且道德本身不是孤立的,如果我们把对现实和乡村问题的思考仅仅归结到道德层面上,就会不自觉地掩盖其背后隐藏的制度或其他方面的问题,从而转移对现实批判的方向。《昏夏》、《干燥的季节》对马东和刘全的刻画就有某种漫画化的道德贬损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把小说所要揭示的问题简单化了。另一方面,它又削弱了小说对人性开掘的深度。《秋日无风景》中爱农的精神问题和人性的探索多多少少因为对色狼老古的道德谴责而冲淡了。《花花琉璃玻璃球球》本来是一个颇有深度的精神分析话题,但由于作者有意把黑二处理成一个道德败类,这很大程度上就掩盖了对铁椎杀死黑二行为背后的人性内涵和心理内涵的挖掘。我想,这可能也是刘玉栋在对乡土进行道德化处理时所始料未及的问题。

二

与道德化的乡土世界相呼应,刘玉栋对人物的塑造也基本上遵循道德化的思路。他的小说人物都烙上了“乡土中国”的典型烙印,而老人与儿童则构成了其小说的两极世界。这两个世界内的精神风景体现了刘玉栋人物塑造的深度与特色,而以这两个世界为价值坐标对乡土中国的观照也赋予小说独特的魅力。因为从人生层面来说,老人与儿童代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老人的阅世沧桑和儿童的纯洁童真本身就具有某种道德力量;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儿童和老人都是相对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境遇也极容易唤起道德性情感。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刘玉栋小说的艺术价值也正是建筑在这两极性的人物世界上的。

先看老人形象,刘玉栋的小说世界中贯穿着一个老人形象系

列,作家对老中国儿女精神世界、伦理情感和生命状态的体察堪称一绝。《雾似的村庄》中的汝东、《葬马头》中的刘长贵、《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的刘小鸥、《干燥的季节》中的王久贵、《平原六章》中的爷爷、《火化》中的连根爷爷、《和你说说话》中的爷爷奶奶、《火色马》中的母亲都是很有性格魅力和人性内涵的典型形象。在作家笔下,这些老中国儿女首先是作为乡土中国的道德化身出现的,他们是乡土中国的“活化石”,他们见证了乡土中国的历史变迁,在他们身上凝结了丰富的历史内涵、道德内涵、人生内涵和文化内涵。他们经历了各种苦难,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做人的尊严。《雾似的村庄》中的汝东由一个“英雄”变成一个艰难求生、忍辱负重的“老农”,但他对家庭、对妻子儿女的伦理情感却炽热得令人感动。他对米大脚的道德宽容与对女儿乃染私奔的默许,既是一种道德本能使然,更是源于民间世界那种出自天性的理解与爱。而他最后因乃木惨死而愤然背井离乡的举动则是出于对乡土和人性的双重道德绝望。《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爷爷对土地的崇拜和虔诚,其死在土地上的意象,也是老中国儿女土地情结的一个典型表征。在这里,土地是人格化的,有生命力的,对土地的尊重,也正是对人与土地道德关系的尊重。与此相应,《葬马头》中刘长贵对于滚蹄子马异乎寻常的人道情感,《火化》中连根爷爷对于“入土为安”的追求和对于“火化”的恐惧,其背后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而是关联着老中国儿女对“人与自然”的一种朴素的哲学理解。其次,这些老中国儿女在小说中同时也是作为乡土中国情感美德的化身来表现的,他们的节操、情感和无奈恰恰是对现实世态人心的一种对照、反衬和批判。《葬马头》中刘长贵的“反常”正是对全村人疯狂的“马肉”欲望的讽刺,《跟你说说话》中爷爷对婶婶的下跪、婶婶的自杀都是对“堕落”的父亲的道德审判。而《平原六章》中爷爷对耨车

的特殊情感、《火色马》中母亲对苦难和不幸的承担、《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爷爷在土地上的“坐化”也都完成了对老中国儿女情感节操和深层道德心理的成功挖掘。有意思的是，在刘玉栋的小说中“父亲”基本上是缺席或失语的，《干燥的季节》中王喜祥的“父亲”是个“哑巴”，《平原六章》中的“父亲”变成了黑鱼，《火色马》中的“父亲”去世了，而《跟你说说话》和《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的“父亲”则进了城，同样成为一种“不在”。在刘玉栋这里，“父亲”实际上也被改写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失节”的象征。“父亲”代表着对土地、对亲人、对乡村伦理和乡村道德的背叛，代表着对欲望的屈从和对都市的投降。在《跟你说说话》和《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父亲”和“叔叔”都无法在乡村露面，他们成了在爷爷和母亲眼里的缺席审判对象。正是通过对堕落“父亲”的审判，小说完成了对爷爷的道德净化和道德提升。

再看儿童形象。刘玉栋的大多数小说都采用童年视角，这使得儿童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对儿童心理的细腻挖掘成了其小说的一道美丽风景线。《雾似的村庄》中孤独、不合群但对电线、电器有着超常敏感的乃森，《花花琉璃玻璃球球》中有主见、有心计的铁椎，《平原六章》中为换糖而摔伤的弟弟、为一张得不到的照片而悲伤的“我”，《跟你说说话》、《我们分到了土地》、《高兴吧弟弟》中早早品尝到生活的艰辛和苦涩的刘土地、刘长河兄弟，《给马兰姑姑押车》中那个因为过度兴奋而在“押车”途中睡去的孩子红兵，都因其丰富的情感内涵和人性内涵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儿童视角的设立，从叙事学意义上来说，是对成人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一种超越性观照。他们本人虽然不具有道德眼光，但是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受伤害，他们的苦难，却能“反证”现实和成人世界的不道德。因此，在《雾似的村庄》中乃森的遭遇反衬的正是高老八老婆的忘恩负义，

《花花琉璃玻璃球球》中铁椎的“杀人”也正是黑二这样不道德的“成人”逼迫的结果,而《高兴吧弟弟》、《我们分到了土地》中刘长河等的早熟与受难又何尝不是对“父亲”们的控诉呢?从艺术角度来说,刘玉栋的小说对儿童心理的把握与表现,可以说既十分准确,又十分精彩。《花花琉璃玻璃球球》中的铁椎对黑二的恨和对姐姐的爱都有着人性和心理的依据,他内心的脆弱、敏感和绝望无人理解,读来令人心痛不已。《平原六章》中我和弟弟寻找“传单”前后的复杂心理体验被展示得丝丝入扣,那种绝望和希望交织、悲伤与狂喜轮转的心理感受凸现在小说中,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高兴吧弟弟》中农家兄弟围绕进城上学与否而产生的心理冲突,《跟你说话》中王大手和王大官的深厚友情都既有着童真天性的流露,又有着“现实”苦难的深深烙印,作家虽没有任何煽情的描写,但是冷静的笔调背后却仍然透发出了浓郁的情感力量。在这方面,《给马兰姑姑押车》堪称一篇杰作。在那个物质极度贫困的年代,给出嫁的姑姑押车是一个难得一遇的美差,它意味着新衣服、糖果、地位、自尊心的满足。可以想见,少年红兵在得知马兰姑姑即将出嫁的消息后,心情是多么复杂。期待、担心、恐惧、焦虑混杂一起,搞得他心事重重。而终于获准押车后,他的兴奋、他的各种想象更是刺激得他一夜没睡。这使得第二天他终于担当起押车的重任时,却在车上睡着了。他的所有想象都落了空,尽管支书树青把糖和点心都给了他,但巨大的失望还是压倒了他,他隐隐感觉到,“这些令人向往的东西,结果并不是都那么令人高兴。他似乎明白了马兰姑姑为什么在这样的日子放声痛哭”。他自己仿佛也一下子长大了不少,小说构思极其精妙,对少年红兵起伏不定的心理和情绪的捕捉与描写则更是异常准确和精彩,体现了刘玉栋在儿童形象刻画上的不俗功力。